

第三章 合浦水运交通的繁荣期

合浦紧邻北部湾海域，优良的交通条件促使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拥有良好的出海港口，中原及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出口大多经合浦出海，由海外输入中原和西南地区的舶来品亦多仰赖合浦。在和平时期，合浦成为商人客旅往来密集之所，贸易繁盛，而在战争年代，合浦又往往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

合浦全境大小河流共有 80 多条，最大的南流江在境内全长 82.5 千米，由博白从东北流经合浦全县，入境后一分为五入海。合浦对中原和西南地区的水运交通主要是通过南流江实现的，对外贸易交通则因受航行技术和造船技术的限制，缘海而行，并开凿古运河，以到达交趾等地。

合浦在两汉时期的水运交通道路，相较于前代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繁荣的时期。学者在论证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时，无不强调其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在前往中原的水运交通道路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灵渠。这条水道以合浦为起点，经过南流江、北流江，然后入漓水，过灵渠，入湘江，到达长江流域。在两汉时期甚至秦代，自从灵渠开凿之后，军事行动均是通过此条水道到达合浦，来自东南亚、南亚等海外的商品也大多由此输往中原地区。

从时间上看，从秦平定岭南地区，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越，以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叛乱，都充分体现了这条水道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这条水道在整个汉代得到了延续，并在商旅贸易的影响下，在日常的货物运输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两汉时期合浦至中原的主要水道。由于这条水道的重要性，在东汉也曾对此道进行了修理和加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便记载，交趾征侧、征贰发动叛乱，“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太平御览》也引《郡国志》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1]这些都表明，在两汉时期合浦通过灵渠至中原的水道是畅通且繁荣的。

合浦通往中原或西南地区的水道，均是以南流江为源头，在到达西江后，水运道路开始变得多元。如合浦同西南地区的水运交通便可经牂牁江及红水河，到达西南地区。西汉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分五路进军岭南，其中一路便是由此道进发。《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载“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竹、邛竹”，可见这条道路原是在民间贸易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进而为军事行动所利用。^[2]王元林在《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中提出合浦通往中原的六条水道，便是在此水道的基础上，认为合浦通往中原，经西江，至北江，可有三条道路到达中原。^[3]

总体来看，两汉时期随着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以及合浦海外贸易的繁荣，合浦通往

中原地区以及海上贸易的水运道路是日趋丰富和完善的。

一、两汉以前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

合浦位于亚热带，降水丰沛，河网纵横，合浦地区的人们与水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天然的。《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4]，《越绝书》云“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5]，在这片地区，当时的人们可能疏于骑马、驾车，但却普遍长于驾舟。水路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也是人们最擅长的交通技术。这种情况从非常早期的历史时间就开始发生了，而且，最早的繁荣期就是在秦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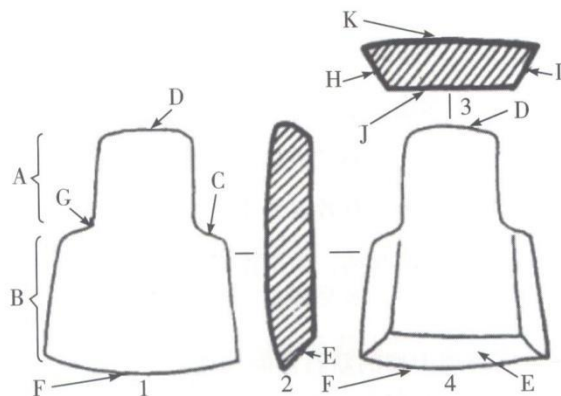
（一）先秦时期的合浦地区

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通过海路形成的文化交往与文化传播。有段石铤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特有器物，这种石制工具除在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发现外，在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社会群岛、苏拉威西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虽然太平洋岛链之间的交通技术并不突出，甚至至今太平洋诸群岛如汤加、萨摩亚等还使用双身独木舟这种比较简单的交通工具，但是从石器器型的一致性来看，这些地点之间人们存在交流的证据是明显的。远程海上航行的设备、技术在当时未必成熟，但以海岛为支点的岛链之间的通航显然是易于实现的。同样，以沿海诸港作为支撑点，在近海以短程航行的形式、航段间接续形成沿海航线的技术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而无论是外海航线还是近海航线，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港口群就在包括合浦在内的环东海、南海沿岸。^[6]

目前广西地区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在汉合浦郡范围内的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东南亚地区文化类型的器物，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合浦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东南亚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明。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64年，1978年4月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324平方米，有柱洞、灰沟、灰坑等遗迹，出土磨制石器、陶片、果核等遗物。发掘者对果核及木炭进行了碳-14测定，果核标本距今约8000年，木炭标本距今约4400年，遗址的年代上限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下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7]该遗址中出土的有肩石器（图3-1），为研究合浦地区与我国东南部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线索。

有肩石器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内涵比较复杂，包括斧、铤、铲等器种。

傅宪国在《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一文中谈到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的关系，这种石器除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外，在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以及波利尼西亚诸岛等地也有发现。虽然其起源中心仍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其分布范围却明确展现了这些地区在先秦时期的交流情况。



1.后视图 2.纵剖面图 3.横剖面图 4.正视图
A.柄部 B.刃部 C.肩 D.顶端 E.刃面 F.刃缘 G.肩角 H.右侧面 I.左侧面 J.正面 K.背面

图 3-1 有肩石器部位名称图^[8]

文献中也有这一区域在先秦时期与中原王朝联系的迹象。《逸周书·王会》引《尚书·伊尹朝献》中有载：

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璆（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9]

覃主元在《广西对外交通史》中即据此条认为，文中“瓠邓、桂国”即生活在今广西或岭南地区的瓠越人民，他们在当时已经向中原王朝进贡这些奇珍。^[10]维系南海港口合浦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路线，很有可能是前文已经提到但未展开论述的南流江。

今天的南流江，古代都是随其流经的政区而得名，先称“合浦水”，后称“瘴江”“廉江”。其发源于今北流市大容山，向西南流经玉林、博白、浦北等市县，汇合多条支流，于合浦县注入北部湾廉州湾。^[11]其干流全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为 9704 平方千米，在合浦县境内干流长 82.5 千米。南流江东边是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云开大山及其入海的延长线，构筑了一道与广东相隔的天然屏障；西侧自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着大容山—六万大山—罗阳山，三者平行伸展，促成了南流江流向走势。杨天保在《新“港口——腹地”文化模型：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史的再发现》文中谈到，古代文明流传的有效媒介主要是河道，甚至可以说，有了河道和便利的内河水运，就有了文明的输出与交流互动，而南流江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腹地—港口互动”的地域文化。^[12]

虽然合浦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大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是合浦地区在先秦时期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是有考古遗物作为证据的。合浦县廉州镇清江村清水江曾发现有石铲，这种石铲在沿海并不常见，主要集中在出土在大陆腹地的今南宁附近。石铲在合浦出土，有学者认为就是以水路为其传播路线，由南宁向南延伸至合浦。而形状类似的石铲在更北的中原地区也普遍存在，见于郑州西郊、河南临汝大张、河南禹县谷水

河等地，所以，合浦—南宁—黄河流域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应可能存在一条文化交流的路线。^[13]

合浦的地理位置和水运交通系统，使得其在先秦时期便已经产生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而对内也有交通路线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族群、国家连接。吕思勉曾曰：“贸易往来，水便于路，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类，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14]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先天的地理条件，在举世瞩目以前，就早已涵养了千年。

（二）秦代到汉初的合浦地区

合浦水道作为贡道、官道、商道，合浦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筹海远征的军港，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秦汉，而这一繁荣基础的奠定是在秦代。合浦港的战略地位随秦王朝统一的进程而日趋重要，合浦港的商贸因秦时灵渠的凿通而日益繁荣。

1. 灵渠开凿后合浦水道与长江水路衔接的完成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进军南越之地，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秦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合浦之地第一次归属大一统帝国的政区，成为象郡的一隅。^[15]这一过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是寥寥数语：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6]

然而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中间的过程一定不是文字记述的这么简单。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在灭楚之后，秦始皇便令王翦“南征百越之君”，此役平定了江南地区，但并没有平定合浦地区所在的南越及西瓯^[17]，直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才最终略取陆梁地，置南海三郡。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

（秦始皇）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18]

从《史记》记载来看，秦攻略陆梁地的军队主要是“楼船之士”，同时是通过凿通渠道来运输作战物资。在进一步深入作战中，却遇到了麻烦，越人采用旷日持久的游击战，让秦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歼灭其有生力量，进而导致了秦军粮食匮乏，于是在越人的攻击下，秦兵大败。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秦军只能对越人采取守势。

这场战争中的交通形势，《淮南子·人间》中有一些记载，其文云：

（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成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19]

秦军五十万人，分为五路进攻百越，一路由今江西省东向，攻取东越，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一路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一路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进入广西，一由镡成之岭入今兴安县，一出九嶷之塞入今贺州八步区。进入福建、广东的三路军队进展比较顺利，很快取得了胜利。在广西的秦军则因河道纵横，军粮运输不便，遇到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派监禄开凿了连接湘水和漓水的灵渠。^[20]

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21]

同样，在《淮南子》的这段记载中，也显示了秦始皇平定南越战争的艰难。这段记载与《史记》相比较，展示了秦军兵败的更多细节，“莫肯为秦虏”也突出了越人与秦军的对立。越人充分利用熟悉地理的优势，乘夜袭击秦军，甚至秦军主帅屠睢也阵亡了，死伤数十万，秦军也由攻势变为守势。

在《史记》《淮南子》的记载中，除了本身作战的困难，都同样强调了物资、人员转运在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无论是《史记》当中记载的“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还是《淮南子》当中所说的“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都表明了秦军攻取陆梁地与凿渠通粮道密切相关。

王子今在《秦汉交通史稿》中便指出：“灵渠是秦王朝为统一岭南而完成的重要交通工程。以尉屠睢为统帅的秦军进军岭南，粮食等军用物资的运输，面临湘桂山区的严重阻碍……在今广西兴安开凿了著名的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系起来。湘江北流，漓水（今漓江）南泻。”^[22]同时，这也促进了不同渊源的兩個文化系统的交流融汇，直接推动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林剑鸣也在《秦汉史》中说：“灵渠的修成时间，约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为秦军取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粮食、给养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来，保障了秦军作战的需用。”^[23]

灵渠的开凿，不仅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加快了珠江流域的开发，同时也沟通了合浦与中原的联系。其路线为从长安出发，经沔水入长江，进洞庭湖，入湘江，进漓江，过灵渠入桂江、浔江，进北流江，过分水坳（桂门关）入南流江顺流而下，

直达合浦。^[24]合浦同中原地区的联系，自秦凿通灵渠后，中原产品输往环北部湾沿岸及海外大多走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是水陆联运、以水运为主的线路，当时的灵渠能通行的船只大约宽5米、长20米，载重可达500~600斛，合今20~30吨^[25]（注：此处核算有误，按600斛为9.6吨），这条路线的安全性、平稳性及载运量均是其他陆路不能及的。

2. 置象郡后合浦港军事战略地位形成

象郡的设置赋予了合浦在南部疆域交通枢纽的地位。秦以象郡为基地，进一步进攻西瓯，合浦成为新政区赖以维持的基地和进一步开疆拓土的必经点。

秦象郡的问题在清以前未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论述，一般都是据《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的说法，认为汉的日南郡即秦象郡，杜佑在《通典》中罗列出了秦象郡所包含的县名，认为秦象郡还应当包括九真、交趾、合浦等郡的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后，也在这一区域内分设七郡^[26]，再讨论岭南乃至整个南越地区内秦代的建置情况，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郡的范围来讨论秦郡的建置情况。

谭其骧认为秦所置象郡，“旧说郡域限于今越南境及粤省西隅，未得其全。按《山海经·海内东经》，沅水出象郡镡成。镡成《汉志》属武陵，在今湘省西南隅，此郡之北界也……《山海经·海内东经》又云：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而《汉书·高帝纪》臣瓚引《茂陵书》谓象郡治在临尘，水及县于《汉志》悉属郁林，今桂省之西部也”^[27]。

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便对象郡的沿革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传统的观点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说法，模糊地认为秦象郡应相当于汉日南郡，杜佑的《通典》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了秦象郡的范围，但原因不详，这些都是“日南说”的观点；1916年，法国人马司帛洛对象郡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依据《山海经·海内东经》《汉书·高帝纪》所引的《茂陵书》以及《汉书·昭帝纪》的记载，认为象郡地跨《汉书·地理志》中郁林、牂牁两郡（今广西、贵州），自秦延续至汉昭帝时方才罢省，这是“郁林说”；1923年，法国人鄂卢梭辑录了七类三十四条史料，据之维护汉日南郡旧说，明确指出，秦亡以后，象郡既废，不再存在象郡问题。周振鹤认为，最能支持“日南说”的几条史料，如韦昭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象郡曰“今日南”，《水经·温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以及《温水注》“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这些都是后人的注疏，却比前人所言详细，其很可能源自《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然后凭想象发挥所致。而

“郁林说”所依据的《山海经·海内东经》对沅水、郁水的记载以及《茂陵书》通过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书对比，其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是可信的。一般而言，《史记》《汉书》本纪的内容是比较可信的，不应随便摒弃，故《汉书·昭帝本纪》所载“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也是可以信任的。在对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周振鹤进一步强调，“郁林说”可以解释象郡的沿革而“日南说”不能，通过《史记》《广州记》《交州外域记》等的记载，秦始皇略定扬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象郡南界与《汉书》郁林郡一致，象郡以南之交趾地（今红河三角洲一带）为蜀王子安阳国所在。秦亡后，南海尉赵佗据南海自立，随之击并桂林、象二郡。吕后、汉文帝时，赵佗南越国势鼎盛，以兵威边，灭象郡以南安阳国，置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置十郡，象郡的建置保留至昭帝元凤年间方罢。^[28]

钱宗范在《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中明确提出，《山海经》《汉书·昭帝纪》所载证明了汉象郡的客观存在，但是西汉的象郡并不等于秦象郡，秦象郡的南端应在今越南中部以南。^[29]“日南说”在解释象郡沿革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在解释蜀王子攻取汉交趾地并建立安阳国的时间和空间时显得非常突兀和矛盾，传统观点认为蜀王子无法击败强秦而建国，即认为蜀王子所攻取的是《交州外域记》所载的“未有郡县之时”的交趾，而不是秦象郡，换言之，则是秦象郡的辖界未到汉交趾郡界。辛德勇在《秦汉象郡别议》中认为，秦象郡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秦象郡南界一直不够清楚，而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学界准确把握秦王朝对越人的控制方略，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疆土界限问题。辛德勇认为“日南说”虽有缺陷，但不能轻易否定，仍可以解释象郡沿革。《秦汉象郡别议》一文通过对东越、南越以及“滇王之印”等的分析，认为汉王朝在新开辟的边疆外族区域置郡，只设郡尉，不设郡守，若是用后世的词语来讲，这只能是基于“土流并置”的原因。而秦与西汉时期在新拓边地实行的特殊治理形式，提示了交趾地区在蜀王子来讨之前先“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这可能是秦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直至赵佗称王岭南之前的情况。秦朝廷对于象郡的统治是以绥靖安抚为主，《广州记》所记雒将“铜印青绶”，可能正是接受诸如象郡尉之类秦官职的管辖约束，同西汉时夜郎侯的子孙出任郡属县的令长一样。蜀王子抵达交趾并建立安阳国的时间，与秦置象郡的辖界是否抵达汉日南郡的境域没有直接联系。另外，秦象郡的地域范围是与越人居住的地域范围密切相关的，秦象郡的郡治显得过于偏远，同时地域也过于广袤，其辽阔地域与其相匹配的社会形态和管理体制相关。辛德勇还提出秦象郡的辖界应该是依据越人的主要分布区域来划分的，即秦朝廷在岭南越人集中分布的区域采取的统治措施，是尽量利用当地土人的首领来治理越民，这是秦象郡辖境广阔的内在缘由。同时，秦象郡的辖区虽然广阔，但是经济程度开发低下，后来汉代单独设郡的区域，当时可能还很难自立为一

郡。而西汉在这一区域内设置的诸郡，充分说明了朝廷对岭南的控制较秦朝已大为增强。辛德勇认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当中，还是“日南说”的理据更为充分，似应首先予以尊重。^[30]

秦象郡的辖界已到达今越南北部，即后来的交趾地域。史籍当中并未明确记载秦军是如何到达今越南北部的。但西汉路博德在破南越后，又移军交趾。《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云：“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为交州。”^[31]黎正甫据此认为路博德经合浦至交趾，“由此可知秦征西瓯亦必由合浦”^[32]。

秦军在攻取岭南地区后，依然面临着越人的激烈反抗。“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33]越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进入丛林之中，采取偷袭的方法使秦军防不胜防，甚至连主帅屠睢都被杀了。秦始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停止了对越人的进一步进攻，“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同时，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秦王朝实行了强制移民的政策。

这样的大规模向岭南移民活动在秦平定岭南地区后迅速得到了实施，并且在短时间内便进行了四次。第一次移民是在平定岭南的当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即《史记》所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集解》引用徐广《史记音义》云“五十万人守五岭”，说明此次移民数量相当大；第二次移民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王朝又一次下令“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次移民则是戍守岭南的南海尉赵佗向秦始皇请命，“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第四次移民为《越绝书》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数次迁徙岭南的移民中，一部分人便在合浦地区留了下来，这为地区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3. 赵氏南越国割据后海上珍宝合浦贡道的奠定

秦末，赵佗乘中原战乱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史记·南越列传》载：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王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

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34]

赵佗在秦时为南海龙川令，至秦二世天下大乱，时任南海尉的任嚣病重，即遗命赵佗，天下的形势已然大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而南海郡的位置偏远，为防止“盗兵”侵入，要提前封锁“新道”^[35]，与外界决断，以待情势变化。同时番禺地势有山海阻隔，东西绵延数千里，秦在攻取南越地后又多次徙民至此，故有中原人辅助，可以立国。而郡中长吏不足以托付，故以赵佗行南海尉事。这当中充分体现了当时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并不便利，仅仅依靠数个关口与中原联通，同时从侧面反映了秦朝这个区域的移民与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

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36]

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实现地方割据，赵佗依照任嚣的遗言，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浚浦关、阳山关、湟溪关，同时断绝四条新道——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今贺州市）一路和湖南入广西静江（今桂林市）一路；并构筑了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随后赵佗进一步攻略象郡，据明崇祯时期的《廉州府志》记载，糠头山位于合浦“西北一百五十里，秦尉佗常驻军于此”。可见赵佗进攻合浦以西便是以此为军事基地，在兼并桂林、南海、象三郡后，自立为南越王。《汉书·高帝纪》载封南越王的诏书称：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佗）为南粤王。^[37]

赵佗统治期间，虽然在高后时期与中原王朝有所冲突，但是大多数时间均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甚至改变了越人“好相攻击”之俗，“相击之俗益止”，使得内部也颇为安宁，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故而汉高祖刘邦在册封赵佗的诏书中称赞其治理有方，“中县人以故不耗减”。

今合浦县丰门岭（凤门岭）位于城区东南郊，是一个低缓的红土丘陵地区，山顶海拔 37 米，面积 330 多万平方米，同时也是汉墓群分布的密集区域。1986 年因配合合浦县第二麻纺厂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了 10 多座古墓。其中最有特色同时保存比较完整的 10 号汉墓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前 3 世纪前后，正好处于南越王统治的时期。该墓

中出土了 34 件陶器、11 件铜器以及 2 件铁器，同时还出土了较多的装饰品，有玛瑙珠、水晶串珠等。^[38] 这些玛瑙珠和水晶串珠等多是舶来品。^[39] 在南越王统治时期，合浦的“对外贸易”依然在和平的环境中稳步发展。同时，南越王赵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麦英豪在《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一文中，即通过对比两广地区 1000 余座南越王时期的墓葬，认为铁器正是在南越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地区发展。^[40]

秦朝在统一岭南地区后，岭南地区的政局大体保持稳定。原本因五岭阻隔，与北方交通不畅，后因“南极吴楚”的驰道以及灵渠的修建，使得合浦地区至中原的道路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口迁徙，使得货物商品跟随着人流开始大量进入合浦，原本用于军事行动的道路，开始逐渐为普通群众以及商人们所熟知，合浦同中原王朝的联系大大加强。与此同时，随着铁器的推广，以及移民带来的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为对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这些都为之后两汉时期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创造了条件。

[1]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六五《地部·江南诸水》，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11 页。

[2] 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23 卷第 4 辑，第 45-56 页。

[3]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86-89 页。

[4]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11 页。

[5] [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乐祖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8 页。

[6] 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1 页。

[7] 于凤芝、方一中：《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 年第 1 期，第 1-8 页。

[8] 傅宪国：《论有段石铎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9]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七《王会解第五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975 页。

[10] 覃主元：《广西对外交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 页。司徒尚纪、许桂灵在其文中也认为在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向这些地区的人民征集贡品。参见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3 页。

[11]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81 页。

[12] 杨天保：《新“港口——腹地”文化模型：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史的再发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第 15-20 页。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考古》1978 年第 9 期，第 14-20 页。

[14]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官南方者之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25 页。

[15] 合浦秦属象郡始见于《通典》，其言“廉州，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见[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21页。其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廉州地方志均采此说。合浦先秦为古越地，两汉时期建置为合浦郡，魏晋时期建置为越州，唐以后称廉州，参见《合浦县志》。

[1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页。

[17] 清代钱大昕曾在《秦四十郡辨》中指出，此役便已取得南海三郡，但无材料支持。同时，平定岭南地区的战争起始时间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18] 同[16]，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8页。

[19]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

[20] 马金霞：《秦平岭南置郡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851-855页。

[21]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

[22]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

[23]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24] 周家干、陈祖伟：《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相似表述还可见该论集中张九皋的《合浦港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等论文。

[25] 广西航运志编纂委员会：《广西航运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26] 儋耳、珠崖两郡于稍后的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所置。

[27]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载《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28]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203页。

[29] 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21-124页。

[30] 辛德勇：《秦汉象郡别议》，《中国学术》（第3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8-235页。

[31]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七《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60页。

[32] 黎正甫：《古代中国与交趾之交通》，《东方杂志》（第二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48页。

[33] [西汉]刘安等编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

[3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7页。

[35] 此处所言“新道”，即“秦所通越道”，在秦置南海三郡后，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为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到达番禺等岭南各地；二为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嶷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为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涯浦关（今广东英德市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为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西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参见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3卷第4辑，第45-56页。

[36] 同[34]。

[37]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页。

[38]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第226-230、283页。

[39] 韩湖初：《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的繁荣“海丝”》，《大众考古》2015年第7期，第50-52页。

[40] 麦英豪：《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岭南文史》1987年第2期，第20-36页。